



敦煌记忆

刘忻 著

 读者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敦煌记忆 / 刘忻著. -- 兰州 : 读者出版社,
2022.8
ISBN 978-7-5527-0669-7

I. ①敦… II. ①刘… III. ①敦煌 (历史地名) — 地方
史—史料 IV. ①K9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2) 第009597号

敦煌记忆

刘忻 著

责任编辑 房金蓉

封面题字 刘忻

出版 读者出版社

地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730030)

邮箱 readerpress@163.com

电话 0931-2131529(编辑部) 0931-2131507(发行部)

印刷 兰州银声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开本 710 毫米 × 1020 毫米 1/16

印张 18 插页 3 字数 300 千

版次 2022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2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27-0669-7

定价 8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

序

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敦煌有说不完的故事，又有孳乳新故事的旺盛繁殖力。从战国时代《山海经》讲述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开始，两千多年来敦煌故事层出不穷。近年随着丝绸之路交通复苏重振，作为丝绸之路重镇的敦煌愈来愈引人注目，“敦煌故事”又成了人们挂诸口头的谈资，更有“敦煌故事”中人现身说法，向人们讲述“敦煌故事”。其中一位久负盛名的大手笔——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刘忻先生就写过好几本讲述敦煌及河西故事的书，如《探寻秘域走廊》《玄奘瓜州历险之谜》《贝格曼黑河大发现》《激情依然》。他还策划、设计并主编了三套创意不群的中国古代文化丛书——《牧歌流韵——中国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珍》（全10卷）、《丝路驿传——中国古代驿传文化探寻》（全5卷）以及《中国马文化》（全10卷）。如今，他又推出一本专讲敦煌故事的书——《敦煌记忆》。

此书所讲的故事都发生于今时之敦煌，关涉今世之人，且是他亲身经历，信而有征，非子虚乌有之可比者。这些故事虽发生于当世，却往往牵涉敦煌古事，例如《鸣沙山现“千古奇音”》，讲的是1991年，敦煌电视台记录当地政府组织小学生进行“滑沙流响”活动的故事，却牵扯到东汉、晋、唐以及清乃至民国的旧事：1991年端午节期间，敦煌市组织200余名中小學生登鸣沙山，进行滑沙震响实验，当时敦煌电视台负责活动的录音录像。“流沙鸣响”的传说由来已久，上溯东汉、晋唐，近及清代、民国时期。东汉《耆

旧记》记载：“水有悬泉之神，山有鸣沙之异。”晋代《三秦记》记载：“河西有沙角山，峰岨危峻，逾于石山。其沙，粒麤色黄，有如乾糒。又山之阳有一泉，云是沙井，绵历今古，沙不填满。人欲登峰，必步下入穴，即有鼓角之音，震动人足。”《西河旧事》载：“沙州天气清明，即鸣沙闻于城内。”又载：“人游沙山，结侣少，或未游即生怖惧莫敢前。其沙或随人足颓落，经宿却自还山上。”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载：“鸣沙山，一名神沙山，在县南七里。今按，其山积沙为之，峰峦危峭，逾于山石；四面皆为沙垄，背有如刀刃，人登之即鸣，随足颓落，经宿风吹，辄复如旧。有一泉水，名曰沙井，绵历今古，沙填不满，水极甘美。”莫高窟出土五代时期的《敦煌录》载：“鸣砂（沙）山……悉纯沙聚起，此山神异，峰如削成，其间有井，沙不能蔽；盛夏自鸣，人马践之，声振（震）数十里。风俗：端午日，城中士女皆跻高峰，一齐蹙下。其沙声吼如雷。至晓看之，峭岨如旧。古号‘鸣沙’‘神沙’而祠焉。”清道光、光绪年间及民国五年（1916年）、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敦煌均举行过滑沙引鸣活动，也都留下了文字记载，但无音像记录。1991年，由敦煌民俗学会发起，敦煌市体育运动委员会、敦煌市教育委员会及中小学等单位联合组织的实验活动于5月28日（端午节）正式拉开帷幕，200余人分别在鸣沙山三处登山滑沙，一声令下，流沙随人群下滑，果然发出轰鸣。敦煌市环境保护局监测流沙声响，结果竟高达54~82.5分贝！加上敦煌市电视台全程录音录像，“流沙鸣响”破天荒头一次留下了音像记录及测声数据。甘肃电视台及中央电视台播送此次活动，各地电视观众得睹奇观、得闻“雷霆金鼓之响”。《鸣沙山现“千古奇音”》一文蕴含着多么绵远厚重的历史，让人遐想浩叹！

又如《光华门下的“悲剧”》一篇，是刘忻先生关于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小说《敦煌》改编为电影、来华进行拍摄活动的忆述。1978年6月，当时身为记者的刘忻先生受甘肃省电视台之命随往采访。30多年后回忆此事，尽管只是拾回若干片段，却已让人大开眼界。文章中说，日本东光德间事业集团总裁、东京国际电影节主席德间康快为了摄制这部影片，“前后策划筹备十多年时间，筹资40多亿日元。”“选演员时，为了争扮斯鲁比娅（回

鹤王女)，日本国内掀起了一阵‘敦煌热’，前往试镜的妙龄女郎多达 1.2 万人，最后，身高 167 厘米的中川安奈被幸运地选中。”“中国方面则在置景、人员、电力、通讯、后勤保障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由于拍摄场景多、规模大，动用人力物力特别多，转移拍摄场地时，中方有关部门在当时运输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先后为剧组安排了 75 节火车车厢，出动了 8500 多台次大型卡车——仅从酒泉往敦煌转场，酒泉地区就出动了 8 吨重的大型卡车 260 辆。军马、骆驼，看起来不起眼，但在这部影片中是举足轻重的活道具……中方专门从北京、内蒙古、甘肃等地抽调了 300 多匹英俊强健的战马和一批马术运动员，先后共出场 4 万多次；仅为运输 130 万斤马料，就先后动用了 480 多辆汽车；还有摄制组上千人的一日三餐问题，由于工作性质不同，人员来去不定，从凌晨到深夜都有人就餐，为此酒泉宾馆、嘉峪关市和敦煌县有关单位的职工全力以赴、早起晚睡，保质保量地把热腾腾的饭食按时送到一二十公里外的拍摄现场……这些都在中日联合拍摄电影史上创下了纪录。”中日两国为摄制《敦煌》影片付出那么大的投入，今日之读者仍不能不为之惊叹！

《遥远的敦煌》记作者第一次从酒泉往敦煌行旅之繁难。“从酒泉到敦煌的班车(汽车),要在颠簸的路上跑上一个整天。若坐火车,时间则要长些,从酒泉上车,七八个小时后,在安西县(今瓜州县)的柳园车站下车,这时都没有了班车,一般都要在柳园住一夜,第二天再乘班车到敦煌。”“第二天去敦煌也面临着买汽车票的难题。那时从柳园到敦煌,一天只发一趟班车,后来才变为了两趟,但依然是一票难求!售票窗口一般买不到车票。高老师肯定是又费了一番心血才买到两张票。车是老式的公共汽车,也就二三十个座位,木头条制的硬靠椅,窗户没有密封。在搓板路上行驶,颠簸得很厉害。中途到西湖乡境内时,司机都要停车,乘客下车后多在野地里找地方方便。路边没有可以买到食品的商店,更没有小吃部之类的饭馆。这样的路面,汽车一小时只能行驶三四十公里,128 公里的戈壁荒漠,走了 3 个多小时,最终停在了敦煌县城西门外的路边。下车后,我们拍打掉满身的尘土,提上背包,向东赶往阳关路上的敦煌县招待所。”“就这样,从酒泉到敦煌

400 公里的路程，我们走了一天半时间，精疲力竭。可想而知，在当时那样的交通、食宿条件下，会有几个人跑到地处遥远西部的敦煌旅游呢？外省的人，特别是几千公里外的东部游客，要中转折腾多次才能抵达敦煌，没有相当的勇气是不行的，其行旅动作之大绝不亚于今天一次出国。”我研究过晚唐咸通八年（867 年）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从敦煌入质长安，乘马而行，至少耗时两个月。敦煌宋荣先生回忆 1930 年代他去酒泉上学，乘牛车 4 日到安西县（今瓜州县），又 3 日到玉门镇（今玉门市），在此休整 1 日并备办干粮、饮水；又 4 日方抵酒泉，共耗时 12 日。彼时旅行之艰辛令人怖畏！而今日从安西、酒泉往敦煌走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数小时可到，更有飞机航班一二小时可到。今昔难易之别，让人难以设想！

《藏经洞秘籍破解“大海道”》是作者对其走过的一段“大海道”的若干回忆。这条古道早被遗忘，所以竟不知它在唐代有“大海道”之名。清末敦煌出土唐代《西州图经》记载：“大海道，右道出柳中县界，东南向沙州一千三百六十里。”今人由此方知此路之取线。2000 年 2 月，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联合进行“大海道考古探险穿越活动”，“14 名队员乘坐着沙漠越野车在 12 天的时间里，经过艰苦的跋涉，走完了丝绸之路古道中最危险的一条险恶之路——大海道。”才知道古代敦煌与吐鲁番之间居然有这么一条捷径。

我作为此书出版前的一名读者，有幸先睹为快！得知其书，今事涉古，古今交错，旧曲翻新，陈酿新尝；多是“故事套故事”，故事中又有故事；是回忆录、是随笔、是游记，又是琐谈。让读者长知识、增见闻，留回味、敷余香。其行文有时轻拢慢捻，有时珠落玉盘；或者从风举袂，或者一骑绝尘；发人联想、启人遐思、引人感慨、催人振奋！

刘焯先生《敦煌记忆》就是这样一席令人赏心悦目、口齿留香的美味佳肴！

李正宇读后赘笔

前 言

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启发了我，也催生了拙作。

在步入夕阳的自觉“瘦身”中，我翻阅数十本即将完成历史使命的采访本，准备废弃又略微犹豫。此时，“敦煌”两个字频频映入我的脑海。我发现有关敦煌的记录还真不少。它密密麻麻地记录了我50年间前往敦煌工作、旅游、叩寻的足迹与见闻：有敦煌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有敦煌农村、农民生活状况的见证，有探寻敦煌历史文化遗存的足迹，有赏析敦煌石窟艺术的收获，有游历敦煌大漠绿洲的感受，有对敦煌遗书价值的惊叹，有与敦煌各界人士接触的印象。瞬间感到弃之太过可惜，它可是我在敦煌这个特殊时空里的一份特殊记忆。

英国作家赫克斯特说过：“每个人的记忆都是自己的私人文学。”回首昨天、憧憬明天是人最美好的追求。仔细一想，其实人在闲静状态下，特别是到晚年，最值得品味的并不是眼前所拥有的一切，而是那些早已时过境迁的缕缕时空。一个人拥有丰富的回忆，内心才更加丰盈，岁月才充满诗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回忆是人对过往时空的积极延伸，是人的意识层面的无形扩展，是不受任何外来因素干扰的一份独享的精神资源。

于是，2020年年初，我便将其中大量互不关联的信息做了梳理分类，搭建架构，查阅核实。正当要欢度春节时，新冠肺炎疫情一时肆虐，全国上下街巷空城。我被困于京城，不敢出门，不能下楼。于是蛰伏陋室，开

起草拟书稿，打发了极其难熬的几个月时光。

人生虽说有两万多天，到头来只是一连串孤立片段的集合，随着人的记忆的模糊和淡远，最终刻在脑海里的其实就剩下几个大的片段。冷静一理，敦煌竟在我的记忆里占据着重要一段；仔细一看，敦煌真还是我这一生始终绕不开的地方；屈指一算，除北京之外，敦煌大概是我一生中去过次数最多的地方；回首一想，真是幸运，我年轻时就有机会踏入敦煌，并在50年里不间断地在这块精神家园里屡圆梦想。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1973年日本作家池田大作与英国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在英国的一次关于文明的著名对话。交谈中，池田大作忽然向老一辈的历史学家汤因比问了这么一个问题：“您喜欢在历史上什么时候的哪个地方出生呢？”睿智的汤因比略加思索后，明确地回答：“我希望出生在公元纪年刚开始的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古波斯文明和古代中华文明融合在一起。”显然，汤因比把这里看作是地球上最美妙的地方。人们翻遍地球仪，发现这个人间的“世外桃源”在地球上只有一处，那就是中国西域——敦煌地区。

是啊，这是一块多么神奇的土地，远在西极的敦煌，沙连苍穹，漠接长云，风陪狼烟，霞伴日圆，白草卷地，碎石满川，暑夏苦热，霜冬奇寒，烽火古道，障塞边关，铁马挥刀，射骑惊弦，青灯佛祖，幽窟涅槃，商驼铃鸣，胡舞飞旋。

数千年前，一个特殊的机缘，相隔甚远的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波斯—阿拉伯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各自独立的四大文明就像被吸引的四条奔腾的河流，沿着三条远古丝路的“河床”一齐向西域奔来，向敦煌奔来，最终在这里汇聚成五彩的湖泊，编织成绚丽的花结，交融成独特的文明。文明的浪花在这里飞溅、碰撞了很久，敦煌、西域一举变成了举世闻名的世界级人种荟萃之地、世界级宗教场所、世界级语言交流区域、世界级文化集市和世界级商品市场。尽管从行政区划上看，敦煌似乎不在“西域”之列，但敦煌和西域却有着共同的自然、历史、文化、艺术、宗教体系。敦煌是依托着西域掌控中国文化西传和西方文化东播的重要出入口，敦煌和西域是捆绑在一起的高度融合的文明进化共同体。

敦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遥远的梦。人们聆听着敦煌的历史，回想着敦煌的诗篇，浏览着敦煌的视频，都想离它近些，再近些。敦煌甚至有时候会成为人们出发的借口，或者是人们归来的理由。

花从春里走来，留下缕缕清香；云从穹空飘来，洒下片片雨露；我从敦煌走来，也带回一段段美好的记忆。每次到敦煌，我都会步入苍凉雄浑与斑驳陆离的历史甬道，以史明理，启迪心智，得到心灵的洗礼；每次到敦煌，我都会走进旷野蓝天和大漠风尘的戈壁绿洲，透视生命，敬畏天地，从而与自然拥抱；每次到敦煌，我都会穿行于壁画彩塑、神话现实交错的艺术画廊，透析文化，吮吸精华，在文明的熏染中提升艺术修养；每次到敦煌，我都会汇入充满喜悦、如饮甘醴的旅游人流，敞开心扉，物我两忘，在时间的流逝中见证敦煌的可喜变化。

我把这些断断续续的零散记忆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对早期敦煌、莫高窟的观察、印象和记忆，有《遥远的敦煌》《遐荒小城》《初访莫高窟》《敦煌电影院》；拍摄莫高窟首部电视纪录片的经历及与莫高窟研究者们的友情，有《两位大师的点拨》《绝无仅有的礼遇》《牌坊后的四合院》《曾经裸露的“北大像”》《40年前的一份解说词》《常老为我们“搭桥”》《风沙陪伴着墓碑》；对20世纪后30年敦煌农村和农民命运变迁的记载，有《鸣沙山下蹲点》《“沙山来了医疗队”》《与风沙“共舞”》《那次梦魇之后》；对中日两国合拍大型电影《敦煌》场景的记录，有《沙州城下的“厮杀”》《光华门下的“悲剧”》；对敦煌改革开放历史的见证，有《竹下登访问敦煌》《奈伊的敦煌一日》《千佛灵崖上的“角逐”》《从敦煌南上高原》《在“大本营”迎来送往》；对敦煌自然环境的踏勘探索，有《南湖“绿岛”的秘密》《敦煌最后一道防线》《敦煌母亲河》；两次赴日本摄制致力于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文化传播的日本友人纪录片的经历，有《相逢世田谷》《伊豆的文学海风》《德间康快的“敦煌梦”》《最爱敦煌的日本人》《亲戚般的情谊》《张大千的艺术拐点》《函馆的敦煌“粉丝”》《浅草寺访京户慈光》；对敦煌历史文化遗存的叩寻，有《乐傅的精神坐标》《藏经洞秘籍破解“大海道”》《边界线上的粮仓》《悬泉置里寻选题》《阳关边的“楼兰”》《湮没的沙漠小道》《汉阙的基因传递》《两关之路》；

对敦煌半个世纪发展变化的纪实,有《沙山下的“驼户村”》《柴达木人的“杭州”》《下湖挖柴的终结》《“文博会”上看变化》等。

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中都有着不同于他人的特定内容,都具有特殊性。笔者隐隐约约地预感到:自己看到的那个敦煌、经历的那个敦煌和感受的那个敦煌也许是独一无二的,自信这些记录和回忆会给读者展现出一个鲜为人知的敦煌。

刘 妍

2021年6月8日

目 录

CONTENTS

1970年8月27日	遥远的敦煌	/001
1970年8月28日	遐荒小城	/007
1970年12月9日	初访莫高窟	/013
1971年4月11日	敦煌电影院	/019
1972年8月27日	画家高尔泰	/024
1975年3月4日	鸣沙山下蹲点	/030
1975年3月14日	“沙山来了医疗队”	/035
1978年4月14日	牌坊后的四合院	/041
1978年4月20日	两位大师的启蒙	/047
1978年4月22日	藏经洞的窟主	/053
1978年4月27日	曾经裸露的“北大像”	/059
1978年5月3日	绝无仅有的礼遇	/064
1978年5月13日	40年前的一份“解说词”	/069
1979年9月5日	下湖挖柴的终结	/074

1980年8月15日	与风沙“共舞”	/080
1981年9月16日	那次梦魇之后	/085
1983年8月8日	从敦煌南上高原	/089
1985年9月27日	奈伊的敦煌一天	/094
1987年6月16日	沙州城下的“厮杀”	/100
1987年6月18日	柴达木人的“杭州”	/105
1987年6月26日	光华门下的“悲剧”	/111
1988年8月27日	竹下登访问敦煌	/117
1988年8月28日	千佛灵崖上“角逐”	/122
1989年1月6日	常老为我们“搭桥”	/126
1990年4月26日	最爱敦煌的日本人	/132
1990年4月30日	相逢世田谷	/139
1990年4月30日	伊豆的文学海风	/145
1990年5月4日	函馆的敦煌“粉丝”	/151
1990年5月6日	张大千的艺术拐点	/155
1990年5月8日	浅草寺访京户慈光	/160
1990年5月16日	亲戚般的情谊	/165
1991年3月15日	德间康快的“敦煌梦”	/172
1991年5月21日	鸣沙山现“千古奇音”	/179
1994年8月22日	日本雅乐 敦煌省亲	/184
2002年7月14日	敦煌秘籍破解“大海道”	/189

2004年7月15日	敦煌母亲河	/195
2007年9月13日	乐僔的精神坐标	/200
2008年9月13日	南湖“绿岛”的秘密	/206
2008年9月24日	风沙陪伴着墓碑	/212
2009年6月30日	墩墩山下的“狩猎”	/218
2009年9月3日	敦煌最后一道防线	/223
2009年9月3日	边境线上的粮仓	/228
2010年5月9日	沙山下的“驼户村”	/232
2010年9月7日	在“大本营”迎来送往	/237
2012年4月23日	湮没的沙漠小道	/242
2015年10月30月	悬泉置里寻选题	/249
2016年9月27日	“文博会”上看变化	/254
2018年9月14日	阳关旁的“楼兰”	/259
2020年9月16日	汉阙的基因传递	/264
2020年9月16日	两关之路	/269
后记		/275

1970年8月27日

遥远的敦煌

整整 50 年了。

记忆的画面朦胧、依稀：汽车扬起的沙尘久久地弥漫在砂石路面上空，孤独的马路伸向空旷的戈壁深处。

那天，我跟着酒泉地区卫生局的高清雨老师，坐上了去距离城南 12 公里的酒泉火车站的班车，去乘火车。我们要到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出差，中途要经过敦煌。敦煌，我向往已久的地方，那几天我的心中特别激动。

敦煌，隶属于酒泉地区的一个农业小县，只有六七万人。从酒泉到敦煌不过是 400 公里的距离而已，但在那个年代，最快也得一整天的时间。

1970 年 4 月，我从插队的知青行列里被选调到酒泉地区师范学校参加“农村中学教师培训班”培训。7 月毕业后，我被选拔到“酒泉地区革命委员会”宣传组工作。8 月份，领导就安排我跟随高清雨下乡整理材料。

全地区地、县、社三级“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代表未到，材料先行。7 月初，地区革委会政治部赵主任接连召开两次会议，要求会务筹备组抓紧时间分组到各县，整理 30 多份典型材料，并在其中选出 10 份推荐给省上。典型材料如何写，写什么？赵主任提出了 8 条要求：一、要突出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二、个人材料要突出毛泽东思想的威力；三、集体材料要突出领导班子作用；四、材料要见人见物见思想；五、材料的语言要符合党的政策；六、事迹不要罗列；七、实事求是；八、要有群众语言。

我刚迈进机关大门，什么也不懂，首次出差就能跟上机关里写材料的高手，是一个多么好的学习机会，真是难得。

从酒泉到敦煌下乡，机关里的干部一般都是乘坐班车或乘坐仅有的几趟火车。从酒泉到敦煌的班车，要在颠簸的沙石路上跑上一个整天。若坐火车，花费的时间则要长些。从酒泉上火车，七八个小时后，在安西县（今天的瓜州县）的柳园车站下车，一般都要在柳园住一夜，第二天再乘班车到敦煌。

当时地区革委会全机关里总共有三四辆“北京”吉普和“嘎斯 69”吉普，经费很紧，每辆车都有汽油指标，地区领导下乡用车往往都不能保证。那时候通往敦煌县城的路大部分还不如现在的一些村际道路，不是坑坑洼洼，就是颠簸不平，吉普车的速度根本上不来。即使跟随地区领导前往敦煌，也得一大早出发。沿途除嘉峪关、玉门镇和瓜州县城，一路都是戈壁沙碛，没有一家吃饭的饭馆和商店，也没有歇息的地方。出酒泉城北关，一路经过北大桥、嘉峪关，驶过黑山峡水库、清泉公社，再驶过玉门油矿农场、赤金公社等上百公里荒无人烟、尘土飞扬的戈壁后，都要赶在中午时分抵达玉门镇，在玉门镇招待所吃午饭。因为过了招待所这个“村”，就再没有下一个“店”了。假如中途遇上汽车抛锚等故障，就没有地方吃饭。玉门镇之后须经过荒芜的饮马农场、黄花农场。虽说是农场，

20 世纪 70 年代，酒泉至敦煌之间的很多路段都是沙土路



但面积太大，公路上看不到一个人。接着是百十公里长的黑戈壁、雅丹地貌无人区，这里就进入了被称为“一年一场风”的安西。假如遇到沙尘暴，就麻烦了，只有赶紧找地方躲避，等待黑风过去。1985 年

的一天，我的朋友戴英森几人乘坐北京吉普从敦煌行驶到瓜州途中时，突然，前方高达几十米的沙尘暴像城墙一样滚滚而来。他们根本来不及躲避，急忙把车停在路边，想一会儿风暴就能过去。没有想到，刹那



20世纪80年代的柳园汽车站

间天昏地暗，刮起的沙石打得车体噼里啪啦地响。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一等就是十多个小时，这场黑风暴刮了整整一夜多，直到第二天的中午方才住手。等他们下车一看，车上绿色的漆皮全被沙石打掉，坑坑洼洼的。

驶过这片无人区后，小宛农场渐露出一线绿洲，会使行人精神一振。在安西城小憩一阵后，再驶上安西至敦煌那单调乏味的、看不到头的120公里公路，除了路左面那毫无生机连绵不断的截山外，眼前是夕阳西下飘动的云霞和刺眼的落日，大多都要赶在晚饭前到达敦煌。

那时最头疼的是买车票和住宿两件事。柳园站是个小站，兰新铁路经柳园通往新疆的Z70次和Z69次列车的车票很少，一般只留几张，卧铺票更少。高老师知道我初来乍到，没有办过买车票的事，估计他没有少费口舌，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我俩上了火车。我向西越过了插队时的玉门镇车站，生平第一次越过玉门，进入玉门至瓜州间的雅丹地貌无人区，进入柳园附近无际的黑戈壁。

我还记得，中年后的高清雨穿着一身当时几乎标配的、清一色的、没有完全褪去尘垢的军便服。他高高的颧骨，戴着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双肩撑起那干瘦的身体，说话时夹杂着浓郁的陕北口音。可能是经常熬夜写材料养成的习惯，他不停地抽着烟，以致他的右手食指和中指都已经焦黄发黑。他的气质颇像一位敬业的中学教师，又像一位循规蹈矩的机



20 世纪 60 年代的敦煌县汽车站

关干事。

我和高老师的那次旅途，既朦胧淡远，又清晰在目。七八个小时后，列车到达柳园，已近夜晚。我们下车出站，街上灯光昏暗，没有几个人影，不多的几家店铺都已关门。高老师非常熟

悉地带我直奔路边一座砖砌的四合小院，这是柳园街上唯一的一家招待所。院落很小，最多有二三十张床铺。可能高老师事先没有给这里打电话预订房间，服务员说：“现在没有房间。”

“所长呢？”高老师有点着急。“出去了，办事情去了。”服务员说。没办法，我们只好坐在小小的传达室里，眼巴巴地等待着所长归来。所长回来后，高老师赶忙上前好言请求，好歹是地委机关下来的干部，所长想办法给我们安排了两张床铺。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时代，招待所所长、车站站长、售票员等岗位的人往往拥有很大的权力。那时的人们往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寻找各种关系，四处奔波，费尽口舌去批条子、“走后门”，以解决一些现在看来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

柳园在甘肃境内，却与新疆近在咫尺。它处于天山东端一块广袤的黑戈壁上，原先是一片没有水源，没有人烟，谁也叫不上名的戈壁滩。1958 年建设兰新铁路时，柳园这地方时来运转，竟然被选定为一个火车站。这主要得益于它重要的地理位置，这里东距兰州 1067 公里，西至乌鲁木齐 825 公里，往南经敦煌可达青海，北面紧靠肃北县北部的边境。这个兰新铁路最西端的终点站——“柳园车站”——原本没有名字，据说在车站西南 8 公里的地方叫“红柳园”，于是就将这个火车站定名为“柳园车站”。